

發現失落的歷史 ——
評介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林 超 超*

書 名：*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作 者：Gail Hershatter
出版時地：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頁 數：xiv+455頁

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本沉甸甸的著述，是賀蕭(Gail Hershatter)女士在中國陝西農村長年訪問研究的集成。在有關中國集體化鄉村和婦女史研究層出不窮的當下，這本學術專著仍以其特殊的觀察和思考角度，值得我們細細品讀。本書的研究起步於 1996 年，在此後的十年中，賀蕭女士在她的中方合作者高小賢女士的陪同下，走訪了關中和陝南的四個選點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村莊，相繼採訪和整理出 72 名中國陝西農村婦女的生活史。這些受訪者大都已過了花甲之年，她們不但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親歷者，而且其中的不少人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就已為人妻、人母，她們的生命故事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三、四〇年代的中國。她們的記憶與敘述對於我們跳脫成文的「國家書寫」及其敘述邏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也正是在此基礎上，本書作者開始了她的學術討論。

全書共十章。首章引介本書立意及方法論，次章著眼於共產黨到來前的陝西農村社會，記錄了當地婦女記憶中有別於主流敘述、因貧困而被迫外出務農、謀生計甚或乞討的早年生活。其後七章作者考察進入 1950 年代以後，在國家設置的土地改革、婚姻法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大躍進」這一時間軸上，當婦女們作為一名率先走出「封建」家庭的女性幹部、積極分子，或是一名在集體化大生產中的女性勞動者、帶頭模範，抑或是一名身份敏感的助產婆，及至一名理應在家操持家務的母親時，她們所經歷和感知的革命，以及社會性別關係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中產生的影響和意義。最後，在本書的末章，作者將受訪婦女作為當下的敘述者，思考個體的人生體驗、記憶、敘述與國家話語之間的交錯與裂縫。

記憶的性別

讀者不難發現，「記憶」與「性別」是本書的兩個關鍵詞。人有兩性之分，那麼人的記憶是否也有兩性之異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記憶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也就必然受到社會性別差異的影響；男性與女性不同的生理特徵以及在社會中不同的職業分工和生活閱歷，都將導致二者在記憶上的區隔。作者在本書中反覆強調婦女對於「運動時期」的記憶與男性有著很大不同，她們脫口而出的生活場景，可能並不被男性所關注；比起「大躍進」這一類標準的國家語彙，她們也更喜歡用「吃食堂時」、「煉鋼時」等鮮活的字眼來鉤連她們自己的歷史。婦女有別於男性的記憶和敘述方式，至少傳達給了我們一點認知，即——缺少中國婦女的記敘，有關中國集體化時代的歷史敘事不可能是完整的。讓農村

婦女這一被宏大敘事雙重邊緣化的群體，走進研究者的視域，其學術價值毋庸多言。

在婦女的眾多歷史記憶中，作者敏銳地抓住她們有別於男性的一個特有領域——家內勞動，作為其觀察 1950 年代中國農村婦女所經歷的革命的核心領域之一。作者相信，中國農村婦女在戶外生產之外承擔的家內勞動雖然在國家話語中被輕描淡寫，但卻深刻地珍藏在她們的記憶當中。從 1950 年代伊始，隨著「婦女解放」的號召、全國婦聯的創建、土地改革和《婚姻法》的實施，以及掃盲等形形色色的宣傳教育和政治運動的接踵而至，大量的中國農村婦女被動員起來外出勞作，參加社會工作；當農業合作化興起、成千上萬的男性被徵調支援農田水利建設之時，婦女成為了農業生產中不可或缺的勞動力，棉花種植逐漸成為她們的專職。但是，國家在重構戶外生產活動的性別安排和婦女的社會空間的同時，並沒有重構兩性在家庭中的分工和責任，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增了婦女實際承擔的社會勞動負擔。

回視如火如荼的集體化時代，婦女們仍可以清晰地記憶著自己是如何在白日裡帶著針線上工、開會，如何在深夜裡繼續縫衣製鞋，如何在百忙之餘照看年幼的子女。她們在家務、生育、養育上的艱辛，與國家的主流敘述存在著巨大的落差。正是婦女對於歷史和時間獨特的記憶和敘述方式，還原了宏大敘事中「無形」(invisible)的家庭空間，豐富了我們對於那個革命化年代的體認，也讓我們更精確地把握到「解放」、「翻身」、「革命」這些抽象的術語對於她們的真正意涵。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於農村的婦女來說，是去除她們戶外勞作的羞恥感與恐懼，¹ 擴大她們的社會空間，更為重要的是，它將婦女帶入了新國家所確立的宏偉目標的軌道之上。

1 這一觀點在美國學者羅麗莎(Lisa Rofel)對城市女工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證。參見 Lisa Rofel,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地方社會主義」與「國家的影響」

如果說本書的宗旨之一是通過性別（更準確地說是女性）的視角來觀察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話，那麼它的另一個宏旨則是要通過記憶的塑造或改變來發現「國家的影響」(state effect)。對此，作者一方面強調任何對於社會主義中國婦女生活的考察都不能擯棄對國家的關注，同時也提醒我們注意「所有的社會主義都是地方性的」。換言之，不論國家政令和話語是以何種強有力的姿態下滲，它都可能受到地方實踐的影響，在特定的地域環境中被重新闡釋或扭曲，從而帶有了地方性的印記，並在多年之後，與當地人的歷史記憶與敘述雜糅在一起，哪怕它們有時顯得是那麼的不和諧、充滿了抵牾。

如通過山秀珍（見本書第二章）講述的故事，作者把土改訴苦運動中地方幹部動員婦女訴的「苦」與婦女記憶中的圖景進行對照後發現，一邊是對「舊社會」禁閉婦女的「封建主義」的聲討，而另一邊是「舊社會」中窮苦人家的婦孺已然在外勞作、在家紡織以貼補家用的現實生活；一邊是對「階級壓迫」的控訴和批判，而另一邊是在「階級」內部由於男性的缺席（兵役）給婦女帶來更深的苦難。那些長期被遮蔽的「解放前」的歷史碎片，在婦女們的記憶中被重新發現和拼湊。這種宏大敘事與個體敘述之間的裂縫，通過童養媳張朝鳳（見本書第四章）在婚姻法運動中的艱難抉擇也以另一種方式得到呈現，和婆婆的親密關係讓朝鳳對自己和夫家的「封建」婚姻關係心存留戀，而非憎恨。

與山秀珍、張朝鳳相比，曹竹香（見本書第三章）則是一個典範式人物，在她身上也較直接地體現了新國家對於鄉村社會的滲透。丈夫的早逝使得曹氏在24歲年紀輕輕的時候就成了寡婦，生活的窮迫和一雙嗷嗷待哺的兒女逼著她很快就學會一般女人不會幹的農活。1949年共產黨來到曹氏的村子，曹氏在區委書記提供的貸款支助下組織7個婦女紡紗織布，於集市上販售。這7名婦女都和她一樣，因家中缺乏壯勞動力而較早地擔起了家計。後來曹竹香成爲了村子裡互助組、合作社乃至人民

公社的領軍人物，並同另外四名婦女勞模以「五朵銀花」的稱號享譽全省。

和一般人不同，勞動模範們（見本書第八章）往往留下了更多的文字記載（這些文字往往都是彰顯她們令人稱道的事跡），她們更願意接受採訪，同時她們身邊的人也願意透露更多關於她們的資訊。地方勞模的出現無疑是國家介入的結果，同時它也使得「國家的影響」具有了地方性的明確內容。幹部們通過發展像曹竹香這樣能擔當大任的農村婦女為模範代表，從而影響更多的婦女乃至整個村莊的日常生活實踐。當外來的「蹲點」幹部在村子裡發展地方幹部、積極分子、發掘勞模之時，像曹竹香這樣的人也是不二的選擇。因為她早已經偏離傳統的社會性別分工對於家庭「內」、「外」勞動的設定，並且有著相當豐富的戶外勞動經驗。

於是，這些婦女勞動模範成為地方上集體創作的產物，她們不是在國家政令中直接產生，而是由「蹲點」幹部發現和培養，繼而通過文字和媒體的渲染，以及她們的自我參與而最終成型。然而，即便在曹竹香身上已經鮮明地烙上新國家的印記，她拒絕再婚的私人行為卻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一種「封建」意識的殘留，在地方上一名女性想要成為有公信力的帶頭模範，她必須首先在德行上受人尊敬。

從「無形」到「無酬」的討論

作者對社會主義地方性的討論讓我們看到，社會主義革命並非是一種話語般的存在，而漸漸地具形化或者說有其實用主義的內涵。國家話語與個體經驗的某些出入，也恰恰表明前者的指向性和目的性，它起到規訓和規範社會成員的現實作用。從 1950 年代早期開始，中國的婦女就被動員參加農業生產和社會工作，這對婦女個人、家庭以及集體生產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對於婦女而言，新的生產組織和社會組織把她們拋向一個矛盾複雜的境地：一方面她們的社會交往變得豐富起來，這可能帶給她們一些新

奇的愉悅，但另一方面她們也感到經濟上和體力上的更多壓力。當她們同男性一道在集體化的大生產之中出工出力的時候，家內的勞動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而使得她們在工分體系中不能享有與男性同等的勞動報酬（女性日工分值一般只有男性的70-80%）。性別差異實際上仍然存在，但婦女們也默認了這種不平等的合理性。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農村婦女在家內勞動上付出的辛勞，在以往我們考察中國經濟的時候，是一筆長期被隱去的巨大「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投入。作者認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對「公領域」的著力，而將家庭生活置於革命話語之外，使婦女的家內勞動更是陷於「無形」(invisible)當中。

由於作者在此項研究上的階段性成果在過去幾年中，陸陸續續得到發表和譯介，從而在學界已引起了關注和回應，如宋少鵬就對作者早先有關中國革命與「公」「私」領域關係的論述，²作了很有意思的討論。首先，宋文對作者將集體化時代的中國社會空間簡單以「公」「私」作二元劃分提出了質疑。³在這一點上，作者在本書中也承認，婚姻法運動恰是社會主義國家向「私領域」滲透的一個強信號。也許正因為如此，本書出版的時候，作者沒有再使用「私領域」這一定義含混的概念，而只是採用「家庭領域」(domestic realm)的說法，以區別於顯而易見的「公領域」(public realm)。

宋文繼而對集體化時期中國農村婦女的家內勞動經常從國家話語中消失的現象給出見解，強調國家對婦女家內勞動負擔的「遮蔽」和「無酬」化，是基於高積累低消費「以生產為中心」的發展策略選擇。應該說，宋文將國家對婦女家內勞動的認定問題從文化史的語境，引導到政治經濟學路數的觀照，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嘗試。但筆者始終認為，國家話語只能作為我們理解「革命」怎樣發生的一個參照，而真正要讀懂在中國婦女身上發生的「革命」，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那些實實在在的改

2 Gail Hershatter, "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收入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I): 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頁257-281。

3 宋少鵬, 〈公中之私——關於家庭勞動的國家話語(1949-1966)〉,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期19 (2011年12月), 頁131-172。

變。雖然家庭作為一個勞動場所從國家話語中逐漸消失，但是集體化時代的家庭革命還是發生了。從某種程度上說，婦女的戶外生產和社會活動擠佔了她們在家內的勞動時間，正是國家對家庭領域的一種干預和滲透，只不過這種革命是靜悄悄、不被察覺的。同時，宋文中展現的部分細節，對於我們深入討論本書還提供了一些線索。如宋文提到的《人民日報》與《中國婦女》雜誌的交鋒，這個事件讓我們看到在通常敘述中以「單數」格的形式存在的國家話語，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我們除了要從「地方社會主義」(local socialisms)的角度來看待「國家的影響」，恐怕還必須從時空和發佈主體的維度上來重新考察國家話語本身的複雜性。

最後，回到本書的方法論上，作者通過口述歷史記錄了各式各樣的中國集體化時代農村婦女的生活史，她們當中的一些人可能曾經是那個時代的模範代表和婦女工作者，也可能被時代賦予了另一些特殊的身份標識——童養媳、接生婆，再或者就是一名生長在鄉村的普通中國女性。本書從很多方面上說都是一本很好的口述史教材，它一方面告訴我們這些和文字史料同樣珍貴的一手資料，應該怎樣被合理的使用，另一方面也警醒我們重視口述歷史存在的局限和某些不可逾越的障礙。如那些為數不多，但有文字記載、有名有姓的女性——勞動模範，她們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探尋那個遠去時代裡人們日常生活史的途徑。但是我們也很容易發現，這些女性在回憶她們作為勞模的時代所使用的語言，也正是她們所回憶的那個時代教給她們的話語，她們的記憶已經與官方的歷史語言融為一體，而無法切割。更何況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受訪者的近況已然大不同前，有些記憶在「後毛澤東時代」又被重新建構，作者發現有些婦女已經在使用「舊社會」這個語彙來指代 1980 年代經濟改革前的歷史時段。作者據此對史學家通過文字記錄和口述史料，致力於挖掘歷史人物的純粹內在自我(interior self)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有力的質疑。